



# 韩国

## 新村运动

—— 20世纪70年代  
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韩]朴振焕 著

潘伟光 [韩]郑靖吉 魏蔚 等译

HANGUO XINCUN YUNDONG



 中国农业出版社

# 韩国新村运动

——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

[韩] 朴振焕 著

潘伟光 [韩] 郑靖吉 魏蔚 等译

中国农业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韩国新村运动：20 世纪 70 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韩）  
朴振焕著；潘伟光等译．—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9

ISBN 7-109-10030-8

I. 韩... II. ①朴...②潘... III. 农村—现代化建设—研究—韩国—1970~1979 IV. F331.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90805 号

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北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26)

出版人：傅玉祥

责任编辑 姚 红 闫保荣

---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6.5

字数：132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定价：15.00 元

(凡本版图书出现印刷、装订错误，请向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 主要译者简介

潘伟光：浙江大学农业经济与管理系副教授、博士，曾于2003年9月至2004年8月在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从事合作研究。

郑靖吉：韩国农村经济研究院研究委员、博士。

魏 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曾于2003年9月至2004年8月在韩国国立汉城大学从事合作研究。

## 序

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发展中大国。“三农”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让广大农民群众都过上更加殷实的小康生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实现了由温饱向总体小康的历史跨越，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速，呈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众多不协调、不平衡、不和谐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改革发展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又是十分敏感的社会转型期；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从国际经验来看，处于人均GDP 1000~3000美元这一发展时期的国家有两种发展前景，若应对措施得当，经过若干年的发展，便可以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的转变，顺利吃到现代化的“馅饼”；若应对失当，有可能出现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和社会动荡，掉入有增长无发展的现代化“陷阱”。决定哪种结果的关键因素是看这一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和财富分配是否处理得当，“三农”问题能否有效解决。

我国的近邻——韩国，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时期比较好处理了城乡关系，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了由

传统农业国向新兴工业国转变的成功典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的同时，针对当时农村比较落后的状况，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村运动”，及时扭转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经过20多年的建设和发展，顺利吃到了现代化的“馅饼”。韩国“新村运动”的经验受到了130多个国家的关注。近年来，韩国“新村运动”也越来越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韩国“新村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和原因与我国现在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情况十分相近。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国际化进程加快，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农业弱质、农村落后、农民弱势的问题十分突出。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解决好“三农”问题已成为决定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现代化事业成效的关键。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及时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方略和“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这种形势下，韩国“新村运动”的做法与经验，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卡特中心）潘伟光博士等翻译的《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是由韩国农业经济学家朴振焕博士所著。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村运动”，是由当时韩国总统朴正熙亲自发动和主持的，作者朴振焕博士时任总统经济事务特别助理，有机会直接介入“新村运动”的决策，全面了解“新村运动”的全过程。作者作为农经学者和“新村运动”的亲历者，力求全面、详细、客观地向读者介绍“新村运动”的背景原因、目标任务、主要内容、运作机制和实际成效。在

仔细通读了该书翻译文稿后，获益非浅、感悟颇多，该书对“新村运动”全景式的介绍，不但全面详尽，而且颇为深刻、富有哲理、引人启迪。其中最深刻的读后感有二条：一是对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质内容有了新的认识，即“新村运动”实质是一场由政府发起的，以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造福农民为目的，以倡导“勤劳、自助、合作”精神为核心，开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村庄建设项目和提升农民文明素质的思想教育为载体，物质文明建设与伦理精神教育互动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二是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践成效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的历史进程中，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是可以通过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扭转的，可以做到农业农村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同步推进。我们对该书特别感兴趣的原因还在于韩国“新村运动”对我国目前正在实施的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尤其是浙江省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和全面小康农村新社区建设活动与“新村运动”有许多相通的思路和相似的运作机制。

《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中文版的出版可以说是适逢其时，必将有助于我国社会各界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韩国的“新村运动”，有助于汲取“新村运动”有益的经验来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为此，由衷感谢潘伟光先生等为翻译该书付出的辛劳，感谢朴振焕博士著书的辛劳。

顾益康

2005年7月

## 译者的话

《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一书是韩国农业经济学家朴振焕博士所著的介绍韩国20世纪70年代农村现代化发展历程的专著。朴振焕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曾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农业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一段特殊的经历是在20世纪70年代曾担任韩国朴正熙总统的经济事务方面特别助理，一直在总统办公室直接介入新村运动的决策。因此，作者能够对韩国农村社会发展及现代化有着准确、深刻地认知。在此书中，作者对韩国70年代新村运动的背景、实施内容、过程及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客观地介绍。我国正处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农业和农村也正经历着现代化的过程，因此，译者希读该书中文版的出版有助于我国的学界和政界对韩国新村运动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汲取韩国的经验来为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

韩国是我国的近邻，在60年代经济起飞以前，一直是落后的农业国。在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人均GNP只有67美元，在1962年也只有87美元，是世界上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但韩国自1962年朴正熙总统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经济发展战略获得了巨大成功，国内经济



快速发展。到1980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1598美元。在1995—1997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

在韩国由传统农业经济向新兴工业化经济快速转变的过程中，韩国的农村也较好地实现了现代化。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韩国朴正熙总统直接推动下开始了韩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化之路——实施新村运动。韩国朴正熙总统曾经说：可以把这场运动称作为一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运动。朴振焕博士给“新村运动”下的定义是：通过参加建设村庄项目，开发农民的生活伦理精神，从而加速农村现代化的发展。

韩国新村运动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支持，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随着1979年11月朴正熙总统遇刺，新村运动逐渐式微，然后在80年代开始逐步衰退。

但从今天来看，韩国70年代的新村运动对韩国农村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甚至连他的政敌也尽量避免批评这一运动，形成了世界上“韩国模式”的农村现代化道路，在世界上尤其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一、“韩国模式”的农村现代化——新村运动的特点

（一）这是一场以村庄为单位、很少财政投入、适合时宜的运动

韩国全国大约有1450个乡镇，33000个左右的村庄。在实施新村运动前，很多村庄还处于传统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道路交通落后，电气化程度低，城乡差距明显。新村运动把村庄作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涉及到制约农村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村庄道路的改善，农民住房的翻新，自来水、农村电气化、改良新品种的引入，农家的节俭运动，村庄会堂的建设，村庄事务中农

村妇女的参与以及村庄领导人的培训等等。实际上，新村运动成为了一项农村发展的综合性工程。它的实施，大大缩短了韩国传统农村向现代化转变所需的时间。

同时，新村运动所用的国家财政资金却很少。按照朴振焕博士在书中的估计，新村运动中政府主要资助村庄水泥和钢筋两种物资。在1971—1978年期间，通过各种新村项目，政府提供了每个村庄约2 000美元价值的水泥和钢筋。我们考虑到韩国一个村庄大约有80户家庭这样一个事实，那么8年多时间2 000美元的水泥和钢筋这样的数目是很小的。

同时“新村运动”是适合时宜的运动。在70年代早期新村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和农村的收入还很低，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没影响到农村的土地价格和农村工资水平，政府没有一分财政资金用于所需的土地和劳动力。土地通过农民自己把村庄道路两边的部分土地捐给村庄，劳动力由村民自己贡献。因此新村运动成本相对较低。如果推迟到80年代以后，那么农业劳动力短缺可能会阻碍村庄项目的实施，而且村民可能也不会无偿捐献土地，那么乡村基础设施的发展可能会因此延迟并且农村现代化所需的财政资金也会大大增加。因此，适时的实施“新村运动”工程，为政府节省了大量的财政资金。

(二) 新村运动是一场通过物质文明建设带动伦理精神建设的运动

新村运动通过具体村级项目的实施，不仅在物质上改善了农民生活居住环境，而且在精神层次提高了农民的生活伦理。

70年代新村运动取得明显的效果，据统计1971—1978年间平均每个村庄得到改善的道路是2 600米；修建小桥的总数是70 000座，平均每个村庄2.1座桥；改

善的河岸的总长度大约7800公里，每个村平均改善的河岸长度为238米；1971—1978年间新村项目建设的水库共有24000座，每个村平均0.7个。而且农村电气化的比例从1970年的20%增加到1977年的98%。

同时农村饮用水系统也得到了改善，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大多数农户从他们的住处得到方便卫生的饮用水，改变了农村地区靠农村家庭主妇头顶运水的传统习惯。此外，在1971—1975年期间，传统的茅草屋顶开始消失，代替的是瓦片屋顶；而且20世纪70年代改善的道路促进了对动力机械的引进，韩国传统的劳动集约型水稻生产在1980—1990年间大部分已经实现了机械化。

另一方面，农民的生活伦理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朝鲜民族一直是相对弱小的民族，而且20世纪初以来一直处于多灾多难之中，在1910—1945年，受日本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1945年二战结束后南北划界而治；在1950—1953年又是连续三年的朝鲜战争。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农村的贫困不仅表现在物质上，而且也体现在精神上。精神低落、不自信，听天由命的思想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

新村运动筛选了村一级农民感到有迫切需要的村庄项目，这些项目容易引导全体村民，并且可以通过村民的合作努力后解决。通过新村运动，随着贫困落后村庄的改变，农民思想伦理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宿命的“我们不能做”转变到“我们能够做”。“我们能够做”的态度也增加了韩国人民的信心。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劳、自立、合作”精神转化成农民良好的生活伦理精神。并且这种良好的国民精神，弥补了当时韩国科学技术水平低的不足，提高了韩国整体的人力资本的质量，为韩国经济持续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这是无法用金钱计

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可以说，新村运动一场综合性农村治理运动，不仅促使韩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且帮助韩国人民树立了自信与合作良好的精神道德风貌。

（三）这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群众广泛参与的一场运动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渠道对新村运动进行了协调、服务、培训、指导，尤其是朴正熙总统在新村运动各个方面推动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1970年4月，朴正熙总统亲自提出和发动新村运动，倡导以“勤劳、自助、合作”精神建设新农村。

为了让政府高级官员了解农民这个特殊的问题，在每月经济计划部举行的经济月评会议上，朴总统让人安排了关于成功农民的案例。从1970—1979年，所有的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的领导人都参加这样的会议，并且朴正熙总统一直担任主席。

为了达到全国各界对新村运动的了解和支持，除了对村庄领导人进行培训外，在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韩国社会各界负责人都参加了与村庄领导人一起的培训。从国会议员、部长、教授、法官到新闻记者、企业家等。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与新村运动领导人一起参加培训的人数达到10500人。

政府通过内务部在道（省）、郡（县）、面（乡镇）这一套行政机构来推动，同时对新村运动提供有力、有效地支持。如政府对当时农村建设供应了稀缺而必要的物资——水泥和钢筋，满足农民了迫切需求，在政府的支持下，农村面貌得到了很快的改善。

同时在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下，农民积极、广泛地参与新村建设活动：村庄的参与程度，虽然第一年实施显示村民积极参与新村项目的村庄大概占全部村庄中的一

半，但从第四年开始（1974年），全国所有的村民都已经积极地参与新村运动了。随着新村运动向城市推广，城市街道这一层次兴起适合城市的新村运动，如让家庭附近的街道保持洁净，排队等候公共汽车和的出租车，垃圾倾倒前先装入塑料袋中，保持公园和野餐地清洁卫生，参加街区会议以熟悉街坊四邻，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和鲜花等等活动。群众广泛参与的新村运动改善了全体国民的素质。

（四）农村的现代化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密不可分

新村运动是在农业转型、农村与城市差距逐渐明显的背景下实施的运动，与农业政策又有密切联系。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国内新的农产品需求快速增加。韩国政府在1968年开始实行农业收入增长专门项目。这一项目目的在于推行农业生产专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生产专业化计划在1968年约90个地区实施，建立蚕桑生产区、蘑菇生产区、塑料大棚生产区、苹果生产区、奶牛生产区、肉牛生产区、牡蛎养殖区、板栗生产区等农业生产区域，提高了农产品专业化、商品化程度。同时韩国从1968年起，对大米实行了价格双轨制，即政府从农民手中高价收购大米，然后再低价供应给城市居民。这一政策，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直接刺激了大米的生产。收入的统计数据表明，在1970年，全国农家的平均收入只有城市家庭工资收入的83%，但从1974年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比例朝着有利于农家收入的方向变化。

### 二、韩国的新村运动对我们的启示

韩国的新村运动是成功的，70年代，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矛盾缓和，城乡一体化初步实现，农村的物质面貌和农民的精神状态也大大改善。因此，新村

运动对韩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没有韩国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韩国国家的现代化。

我国正处于解决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关键时期，在同样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中国农村和农民小规模生产的环境下，韩国农村现代化的思路、内容、方法、途径以及现代化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一) 农村现代化并非一定要工业化完成后才来进行的运动，可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

这场运动是韩国工业化进程中发起的，可以说是早期阶段开始实施的，与韩国工业化、城市化相辅相成。韩国1971年国民收入是人均286美元，1980年是1598美元，韩国农业产值结构在1970年是27.1%，1980年占15%左右。新村运动不仅改善了农村面貌，较好解决城乡差距，同时为韩国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高素质人力资源。

我国在2002年农业结构占GDP的15.4%，人均GDP已到1000美元，从这两个基本指标看，我国现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与韩国70年代后期较为接近，社会正经历着快速变迁。

整体上来说我国现在工业化发展需要大量地资金投入。但是，我们并不需要等到工业化完成后才来实行农村的现代化，而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而且我国现在处于有利的时机，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高，经济发展态势良好，财政资金相对充裕，有必要全面展开农村现代化的建设。只要措施得当，方法科学，可以早日达到农村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而且可以很好地处理好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矛盾。

(二) 村级治理是农村现代化成功的关键

韩国新村运动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方法和措施上值得我们借鉴。

1. 了解农民的愿望与迫切需求是农村现代化的实施的基本条件。农村各地情况差异显著，实施农村现代化要从农村的具体实际出发，尤其是要从村庄的实际出发。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有重点建设。为此，需要进行调查，了解农民在农村发展中的需求的优先序；同时需要适当地分类，明晰政府的职能和作用的发挥的边界，确定哪些由农民自己解决，哪些可以合作解决，哪些需要政府解决。

2. 村庄的改善要从实实在在的项目做起，而非纯粹的精神运动。韩国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项目的纽带，才能进一步团结村民，提升道德水平，也才能创造和谐的农村。

3. 村庄领导人的综合素质是决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对于农村建设来说，村庄领导人的奉献、廉洁、为民的思想道德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非常重要，将直接影响村级项目的成功开展。

### （三）农村现代化是一项综合性建设工程

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物质建设过程，也是突破城乡体制分割的过程。这不仅是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村发展本身的要求，也是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平等权利的基本体现。因此，一项综合性建设工程不仅涉及农村物质建设的现代化，也涉及精神伦理的现代化，也包括相应制度层面的现代化。

1. 需要对农村进行物质设施方面的改善，提高农村地区生活条件。包括对村庄居住环境、居住条件的改善；完善公共卫生设施、排污设施；建设便利的道路交通系统等等。

2. 逐步建立城乡均衡的福利政策制度。如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等制度覆盖到农村。

3. 加强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一方面对农业劳动力进行农业经营方面的指导、培训；另一方面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实施农民的再就业工程。

4. 完善基层民主体制，真正提高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实现农民的自主决策。

5. 女性是农村中一支重要的人力资源力量，要重视女性在农村现代化的作用。

6. 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帮助树立勤劳、自立、合作等积极的精神状态。这一点对贫困地区的农民尤其重要。

（四）政府的倡导、推动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韩国的农村现代化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政府的倡导、推动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因此，我国当今的农村现代化也同样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

1. 需要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农村现代化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只有把农村建设和农村现代化放在一个战略高度，有战略性认识，才能一贯地坚持推进农村现代化。

2. 实现农村现代化过程中需要政府部门间相互沟通与合作，而国家各级部门对“三农”问题了解和形成的共识是重要的基础。

3.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为基层的服务能力。关注农村、关注农民，更多地为民着想是党和政府重要的责任。在韩国由于农民是一支重要的选举力量，党派的选举活动在基层农村非常活跃。韩国的农民利益通常为各党派所利用，也使得韩国农业问题一直受政府的重视。



这也告诉我们只有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才能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

总之，无论对于我们了解韩国农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还是对于我们借鉴韩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我国当代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及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该书都是大有帮助的。

本书的第一、三、四、五章由潘伟光翻译，第二章由郑靖吉（韩国）翻译，第六章由魏蔚翻译，第七章由潘伟光、邓健翻译，第八章由金铃翻译，第九、十章由郑靖吉（韩国）、杨奇明翻译，第十一、十二章由潘伟光、邓健翻译。全书最后由潘伟光、魏蔚统校全稿。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中心（卡特）主任黄祖辉教授、浙江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顾益康副主任和邵峰副主任的鼓励和帮助，尤其顾益康副主任在百忙之中为本译著写序，在此表示深深地谢意。同时，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得到中国农业出版社柯文武主任和“卡特”中心办公室方志伟主任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水平所限，译文可能存在错误或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译者

2005年7月于杭州华家池